



人生是一场漫长的“北上”旅途

叶紫欣：

故事中的不少人物都对运河怀有深厚的感情，首先，外国友人小波罗爱运河，是因为爱运河所代表的东方文明。他坚持北上去追寻运河的源头，在船上每天都拿着笔用意大利语记录运河的水文状况和在运河上的见闻。不幸的是他刚刚感受到运河的生命力，爱上了运河，就因病死在运河上。这种“开始即结束”的遗憾是令人惋惜的，但是他给后人留下的运河记载的价值却是永恒不朽的。从小波罗身上我们看到他对文明的热爱是不分国别的，作者以“异域人”视角描述中国的文明，赋予中国文明新的理解，建立了一种鲜明的东方形象。

其次，船民邵秉义将运河当成自己的命。他传承老祖宗的家业，一辈子都在水上跑。后来儿子要离开水上去岸上成家立业，他不反对，但是自己坚决不离开。他告诉儿子：“咱们家是船民，上了岸、上了天都是船民，邵家祖祖辈辈就是船民”。他在儿子的婚礼上将“罗盘”郑重地交给儿子。罗盘作为祖宗留下的交代，能够让一个家族的传统延续世世代代。

最后，是周海阔和谢平遥，他们都以自己的方式默默坚守着信仰。周海阔的“小博物馆”客栈选址都在运河边上，每一家客栈只收藏当地的“老物件”，这些老物件曾经都深深参与了当地的历史发展、日常生活和精神构建，可说是本地生活细节的简史。谢平遥则想拍一部运河的纪录片，把运河上保留着的历史碎片记录下来，传承下去。他们两人都深感敬佩，因为历史的“现实化”和“可视化”在他们身上都变成了事实，这在“一切向钱看”而疲于奔命的当下是难得而可贵的。他们以自己的努力与实干，试图填补人们精神上的虚无和空洞，试图留住甚至重建我们曾经信仰的文明。

一种文明如果失去了它自身的视角而一味从其他视角寻找出路，那文明就可能失去独有的特质；如果家庭的概念已经淡化甚至消解，那它承载的文明也只能留在博物馆中，留在纪录片里，如何建立自身的文化与文明认同，可能才是徐则臣通过《北上》最想得出的答案。

朱思锐：

在《北上》里，有一个概念是被反复提及且贯穿始终的，那就是终点、源头或说是来路。

在文中，它是存在具体指代的：“源头”是小波罗一行人北上之旅的最终目的地，是如谢仰止这样的“运河之子”心心念念要找到的地方，但同时，我认为它更有被抽离出来的、更为抽象的深层含义。源头和终点，同样不止是运河的一端，也不止是祖辈们打下的基石，更是我们这一辈人所坚持的事业的出发点和结束点，是谢望和为运河专家坚守本心的故事深深动容时脱口而出的“不忘初心、方得始终”里的“始终”。

要如何才算是做到了“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呢？《北上》里的“短袖汗衫”孙过程，一开始出现时，每一个眼神、每一句话语，无不彰显着他对洋人恨不得杀之为快的心理；但后来遇到曾经的义和拳同伴时，他却替曾深恶痛绝的“洋妖”辩辩护：“洋人也

有好坏。”这并非是背叛了“初心”，北上一族，对孙过程而言更像是一场重新认识他人、也重新面对真正的自己的修行。事实上，痛恨洋人并非他的所谓初心，心地善良才是。在一切故事的源头，在面对间接害死他家人的赵家人时，他不仅选择了放下恩怨放对方一马，甚至还赠予钱财。为避难加入小波罗一行人之后，他也渐渐放下了原先由于家人被杀的仇恨而产生的对外国人的偏见，这是他的成长。

运河之子们一生总与运河纠缠在一起，这是文本所赐予的奇妙的缘分，但这也是他们天然的命运。我们每个人其实也有自己的天赋和与之而来的使命，人生也就是一场漫长的“北上”旅途。我们一路遇到新的风景，也一路收获着新的自己，但愿行至终点时，我们都能如这个故事中的大多数角色一般，依然记得来时的路：不废这江河浩荡，万古不绝；不毁这平生漂泊，一路逆流。

唐倩薇：

《北上》最让我感触深厚的是“融合”，这样的融合既是人生层面的，又是文化层面的。

《北上》中有一个核心角色小波罗，他豁达、乐观，有小幽默，也有忧郁的时刻。他喜欢模仿中国味，但总是不地道，就算被别人暗暗嘲笑，他也依然自得其乐，很潇洒，很逍遥。在小波罗临死之际，他才真正感受到运河的激昂蓬勃的生命力。他躺在船舱里，日夜聆听运河波涛，他的呼吸和这条河保持了相同的节奏，这时他才真正地融入了运河，就像一粒溶质溶解在恒久流动的水中。

而小波罗的弟弟费德尔的人生又是另一种不同的“融合”。最开始，他才是小波罗自称的那个真正的运河专家，喜爱运河的人，但在他收获了爱情之后，似乎开始真正地融入了中国的生活，他的妻子是中国人，生活方式也是中国式的。他与意大利同胞叙旧，别人却误认为他是“正儿八经的中国人”。但马福德的心灵深处仍然是费德尔：要分家的思想，从未生锈的枪和子弹，弹注一掷的复仇。这是他灵魂中的意大利。

费德尔、谢平遥、孙过程、周义彦、邵常来的后代最后因为《大河谭》交汇。考古专家、节目制作人、画家、客栈经营者、跑船人，几个经济水平、教育背景、思考方式与生活习惯都不相同的人或家庭，最后因为一条共同的运河融合在了一起。小波罗本来无意于运河，但生死存亡的经历让运河与他的脉搏相连了；弟弟本来最热爱运河，但他爱的寄托从运河变成了一个。而他们的故友乃至自己的后代，也持续不断地陷入这种融合的状态里。

郑沁辰：

《北上》的故事读出的不仅有运河在历史沧海桑田之下的兴衰，感受到更多也更值得回味的，是书中人物相对于浩荡运河之下的渺小所带来的感慨。

“小人物”既是群体中的某一个，也是群体中的每一个。小波罗穷极一生，想要追寻偶像马可·波罗的足迹。一个洋人举手投足间却深刻融入了中国文化，奈何对运河产生情意之时却已行将就木。此后，只有相机、星盘和纸张记得他的故事；大火在

教堂烧起来的时候，孙过路对孙过程说：“走，是为了回来”，奈何故人至死尚不得一个安详的归宿，也 only 被孙过程一人铭记；邵秉义与邵里池世代靠水吃水，却被现代化席卷压得透不过气，和万千船家的叹息一样淹没在科技的轰鸣声中，无人共情；马福德守着得来不易的爱情隐居乡村，却落得“被日军荼毒”而无能为力；谢望和在蝇营狗苟的现代都市和逼仄的生活重压下，仍然选择坚持自己的初心，不论结局成败，都不过是时代洪流中奋斗青年的缩影而已。

“小人物”是脆弱而无力的，但这并不代表他们的故事是无意义的，小波罗渴望通过归属于中国文化之中，追随自己的一生所想探求的理想；孙家兄弟渴望归家，回到曾经属于自己的心安之处；邵家父子，他们心底的归属是河流与跑船，那是流淌在他们血液中的存在方式；马福德30年相爱相守的如玉，是他和世界的惟一联系，是他异乡的惟一归属，是他的生命之光；谢望和对于《大河谭》的执著，是一份对于运河、对于身世的宏大情感，是归属，也是归根。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书中的角色或多或少随着运河挣扎着、彷徨着、抵抗着，也爱着。正如现今城市化进程中的“北上”与“南下”，时代之大，人之小，人们背井离乡，似是夜幕下的一瞬光影，带着自己或许已经无从感知的过往与文化使命，蜂拥到霓虹映照的纸醉金迷下，想求得的也不过是小波罗那样的“梦想”，又或者者孙过程兄弟俩为了“家”的“闯劲”、是邵家世代以来的“执念”、是马福德对于美好的“追求”、抑或是谢望和孙宴临那样的“情怀”。然而，又有多少人消磨到最后还记得，还尚存一息执念？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忘了归根。

汪佳源：

北上，不仅是地理之北，更是精神之北，心灵之北。一条河，四代人，将彼此的命运都牢牢地联结在了一起，跨越时空，串起几个家族之间的秘史，回溯了小人物在大背景下的点点滴滴。

在这部体量庞大、格局恢弘的长篇作品中，徐则臣先将人物全部放置在同一个时空中，再通过时间点和章节的分割，将每个人物及其家族的主线剥离开来，独立成章。但无论是谢平遥家族，还是孙过程家族，亦或是邵常来家族、马德福家族，他们在百年中的发展变化都与运河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并且最终都与他们的祖先当年一样，生活的轨迹与运河的脉络逐渐于年岁的流逝中合而为一。

整部小说值得关注的，除了徐则臣精心铺排的情节结构与世世代代传承的主题，还有章节北上（二）的结尾——废漕令的颁布与小波罗的离世仅仅相隔10日，他们与运河的兴盛衰亡同起同落，甚至同生共死，这样的羁绊也深深地融进了后代们的血液中，刻在了后代们的头上了。

上上下下的水，顺水，逆水，起起落落，随风流转，因势赋形，亦如人的生命，起起伏伏，情势多变，顺逆交错。但往往一个看似细微的事件，亦能够触动那条命运的绳。行船日常生活的定格，罗盘的被

卖，《大河谭》的拍摄，将这几位看似毫无交集的人联系在了一起，成为了他们之间坚韧的纽带，构造出了当代的运河诗篇，正如同百年以前，他们各自的祖先那样。1901年，他们的祖先因运河而相遇，2014年，他们因运河而相聚。

臧雨晴：

1901年，一帮不同来历不同出身的人，怀着各自的故事，相遇在运河，一路北上。路上有快乐和安宁，有躲不开的麻烦，有悲伤和无奈，还有在变动混乱的大环境下的不安和心思。简直有点江湖气，角色都是小人物，史书上留不下姓名，却各显神通身怀绝技，人物鲜明可爱至极，跌宕起伏的这一路路，水连绵相伴。2014年6月，这支北上小分队的传奇成员的后代们阴差阳错济济一堂，那根让小波罗深深执著的手杖之谜被解开，2014年的故事，这条未来之河，似乎终于要和113年前的那河水汇合了。但是最后一章的叙述者谢望和，却来了一句“我要把所有人的故事都串起来”，这看上去，是把吸引人的北上之旅的故事归为《大河谭》里的一笔，这一段传奇似乎被盖棺定论为虚构的了。

2012年、2014年的故事，都是第三部时的当事人亲身经历的，但是除了费德尔的事例还有迹可循，北上（一）（二）里角色的经历已经湮灭在时间中，2014年的只言片语还原不了全貌。1901年的内容，可以理解为是谢望和等人虚构出来的历史，也可以理解为是上帝视角的作者讲述的“真实”。可如果北上只是后人人们在《大河谭》里虚构的故事，那么，为什么书名叫做《北上》而不叫《大河谭》？为什么开头和结尾都是费德尔的那封信，而不是以谢望和的《大河谭》和结尾相呼应？而费德尔的信又是北上的引子。整本书，虽然北上只是占了一部分，但是它从始至终都是全书的核心。所以无论“北上”在作者的设定中，是后人虚构的故事，还是作者叙述的真实，它的这种历史性、它所具有的价值，便是它的真实。

小说本就是虚构的，又嵌套一层虚构，反而更是构建了真实。谢望和说：“一条河活起来，一段历史就有了逆流而上的可能，穿梭在水上的那些我们的先祖，面目也便有了愈加清晰的希望。”就算“北上”的故事是谢望和虚构的，而这段虚构的历史所反映出的真实性，塑造了人与运河水乳交融的关系。大运河最终申遗成功的喜讯，给角色带来的不仅是《大河谭》的投资，还是运河的文化历史意义得到的重视，使运河不再独立地存在于个人的记忆里成为个人的一生，反而超脱而出，连贯起所有枝杈，就像它本来的那样，复活了百年前的故事，复活了百年前的河水，时空在运河之上流动不已。

北上对于《北上》，让我想起北上第二章里的运河愿景。那次天喜地的《驻堤歌》，究竟是真实存在于某处，还只是一场空的幻觉？也许就像这次北上，讲述它的过程里，这段历史就在虚构中活了起来。这当是2014年的运河之子们看见的愿景，是我们读者从虚构的小说中发掘出来的，对于运河的真实赞歌。

1988年,《平凡的世界》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黄土高原的故事与那个年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发生了深刻的联系。据统计,收听过央广《平凡的世界》广播剧的听众超过3亿人,当时的年轻小伙子施战军就是这3亿人中的一员。现任《人民文学》主编的施战军在1988年还是一个文学青年,时至今日,施战军依然对这部杰作称赞不已,“在开头那天地死寂的泥泞氛围中,人的生机突然出现,路遥虚构但不虚设、慈悲但不伤悲、对自然生命和历史运行充满敬意”。

10月22日,在路遥诞辰7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人民文学出版社与陕西省作家协会共同主办的“卅年重聚说路遥——纪念路遥诞辰七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路遥生前好友、路遥研究学者以及路遥著作出版方一道缅怀路遥的为人文,回顾他的创作点滴,并探讨路遥研究进一步展开的可能性。

现实主义与人民情怀

“看一个作家不在于看他写什么,而是要看他能留下的作品是什么。”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所长刘跃进认为,路遥的作品中既充满了现实观照,又饱含着人民情怀。这种现实主义与人民情怀的融合让路遥的作品充满了光明的色彩,尽管写的是苦难、奋斗,但永远给人的是希望,是崇高和温暖。

文学所党委书记张伯江高度赞许路遥“充满诗意的崇高基调”,在他看来,这种崇高的基调与现实主义的方法紧密相关,路遥在80年代放弃了对创作角度与方法的多样化追求,恪守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继承并开拓了博大宏伟的文学视野。

无独有偶,评论家白描也认为路遥的现实主义书写最大的特征就是温暖与爱心。“路遥作品不以冷峻无情的现实批判见长,诗意是他赋予现实主义的新特征。”白描认为,进入新时期后,有的作家仍然将书写重点放在文学对于政策和历史的简单评价,但此时路遥已经把创作的注意力转移到关心人的价值与尊严上,“他关注的是人在一个时代里面,在生活里面,处于什么样的地位”。

评论家白桦谈到,相较于现代派的创作方法,路遥所坚持的现实主义是更适合中国读者口味的,同时也最适合他本人。“但在这个让他成功的‘法宝’背后,最根本的东西还是路遥深切的人民情怀,《平凡的世界》中表达的是人与人民共有的情感,充满了对不同阶层人的精神上的理解、激励、滋养、启迪,这种现实主义和人民情怀构成了路遥作品经久不衰的魅力。”

脚踏实地又魂动九天

路遥的创作是脚踏实地的,和他一样,路遥笔下的人物也总是“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副所长鲁太光认为,《人生》把那个年代有理想的农村青年写活了,路遥面向庞大的现实经验寻找文学资源,克服困难取得了不小的文学成绩,与当时寻求历史文学路径的其他陕西作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仅如此,鲁太



读懂路遥，我们还在路上

光认为,“路遥对中国当代文学也是异质性的存在,他以坚持自己的写作理念抵抗先锋技法的侵袭,保持了精神产品的公共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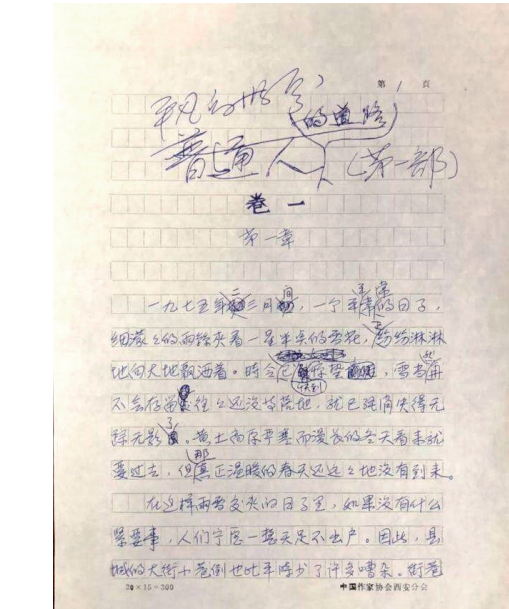
脚踏实地的创作精神背后,是路遥矢志不渝的读者意识。评论家段建军说,在80年代,深刻感受和理解世界是广大读者更关心的人生问题,追新逐奇的艺术表现不能满足更广大读者的期待视野。“从这一点上看,路遥比那个时代所谓的先锋派作家要高明,要清醒。”段建军谈到,路遥的每一部作品,都源于自己的生活感受,充满了个体的生存危机和底层的认同危机,通过个体书写时代阵痛,表现为底层为理想奋斗,却在现实面前遭遇重重阻挠、坎坷和不平的真实境况。“在这种生存危机中,他去探索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到底在哪里,追寻社会以及人的认可,他把握住了不甘于默默无闻的人生的感觉,这种跨时代的同理心和共振感一直从那个时代延续到今天。”

陕西省作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钱远刚谈到,路遥精益求精的写作态度仍然值得今天的作家学习。在他看来,路遥的创作精神是陕西作家创作精神的典范,就是用生命写作的精神,路遥启示当下作家要以传世之心对待创作,克服浮躁,精益求精搞创作。“在《人生》获得巨大成功后,路遥不为一时之利而动摇、不为一时之誉而急躁,把文学看作神圣的事业,执著写一部‘真正的大书’,主动‘归零’,沉下身心,寻求符合中国人审美理想的表达方式,坚持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以‘宗教般的虔诚、初恋般的热情’,‘板凳坐得十年冷’的创作定力、‘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精益求精,经历3年准备和6年创作,用心血和汗水凝结成就了不平凡的《平凡的世界》。”

学界风向正在改变

与读者的持续关注不同,学界对于路遥的态度有些不温不火,专业研究领域的“路遥冷”现象普遍存在。但近年来,有论者指出,用文学评论准确反映文学创作,需要关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家作品,更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路遥的文学创作状况及其创作在社会学层面的意义。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办的权威学术刊物《文学评论》为例,据统计,从上世纪90年代至2012年,在《文学评论》上,以路遥为关键词的学术文章只有3篇,而近几年里,《文学评论》发表的路遥研究论文已有6篇,关注度明显提高。

王兆胜谈到,文学研究中存在一种误区,有些学人认为离开理论和概念没法说话,不管某种理论是否适合解释某个作家的作品,而路遥就是没有时髦理论能够解释的,只能用现实



主义进行评价。王兆胜呼吁,在路遥70周年诞辰之际,应该开启路遥研究的新航向,摆脱概念和理论的束缚,从作品开始,用显微镜看出它的独特的魅力,突破以往研究的限制。

兰州交通大学教授张哲在校内开设《大学语文》课程时,他发现,最受大学生欢迎的当代小说作品,正是路遥的这部长篇小说。在张哲看来,路遥的写作的确具有巨大的不可替代的意义和价值。

在当下,由于阅读、消费和话语主体集中于城市,文学的风尚偏向城市题材,而当代文学的乡土写作总体缺乏明确的清晰的系统,也缺少真正意义上的对于农耕文明的观照。许多以乡土之名进行的作品,实际上未能深入到农业和传统的内核,张哲认为在此意义上,路遥具有系统化的价值和书写能力,对当代文学的写作生态具有建构意义。

路遥研究仅是刚刚开始

摆脱固有的陈旧印象,需要新的材料来说话。学者程光炜近期在发掘、分析路遥文学史料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先后有《文学年谱框架中的〈路遥创作年表〉》《关于路遥1971年春的招工问题》《路遥和林虹关系的一则新材料》等文章面世。然而在程光炜看来,尽管路遥研究中已经有厚夫《路遥传》、航宇



1985年,贾平凹、路遥、京夫、陈忠实等人于榆林红碱淖留影

《路遥的时间》等史料详实的作品,但在路遥为什么要创作《平凡的世界》、路遥在陈家山煤矿深入生活的事迹、第一部小说完成后隐瞒病情的经过、创作《平凡的世界》前后路遥与林达感情问题等几个重要方面,均缺乏可信的材料,不利于研究的进一步展开。“没有这些周边,《平凡的世界》的研究,将会变得非常孤立,处在被历史悬空的状态。”

新材料固然是学术研究必不可少的部分,但新视角往往更会让人耳目一新。陕西白鹿书院常务副院长、评论家邢小利认为,路遥的文化心理结构就是六个字:走出去、在路上。一个人某种心理定势,往往源于童年或少年的某个体验特别深刻的经历,对于路遥来说,9岁那年从榆林清涧走到延安延川,是他生命中至关重要的一个节点。“9岁,对生命已经有了真切的感受,也有了深刻的记忆。这种记忆,已经远远地积淀为路遥的一个心理定势,那就是,尽管他无限依恋,但他还是不得不离开那个贫苦不堪却又温馨的清涧老家,衣衫褴褛,徒步走向一个未知的却可能活口的远方。”在9岁的这次行走之前,还没有路遥其人,后来叫路遥的人这时叫王卫国。“为什么后来会叫路遥?路遥漫漫其修远兮的感受,就是他从这一次走出清涧中萌生的。最后,他干脆把自己的名字从王卫国改成了路遥。”在邢小利看来,作为作家的路遥早在9岁那一年的出走和远行时便已经诞生,“从清涧老家到延川新家,路遥走了两天,但他当时的心里体验时间应该就是一辈子。路遥后来的生命历程,不过就是无数次的重复9岁这一次的生活体验和记忆。他后来所写的作品,《人生》和《平凡的世界》,这两部代表作,也就是对他这一次生命体验的回忆和以复调的形式进行的改写。《人生》把路遥一生要表达的都表达了,它是路遥关于生命、关于情感、关于世界的全部体验和思考的浓缩,《平凡的世界》不过是展开罢了。”